



重返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

周丹丹 李若晖

摘要:费孝通毕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想中,历史维度从未缺席,与历史相关的学术概念、学术话语及学术方法省思贯穿他三次学术生命的始终。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和历史面相包括他早年所受的社会史影响、“三维一刻”的历史功能主义、“差序格局”和“双轨政治”等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社会情境的历史之维和晚年的方法论反思,它们是中国历史社会学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思想资源。全面认识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重返费孝通社会学研究的历史想象力,对于中国历史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关键词:费孝通;历史社会学;社会史;社会情境;方法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6-0028-07

2003年费孝通在《暮年漫谈》一文中,回顾自己早年生活和求学经历,谈及晚年“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并提出“应该多读点历史”。费孝通以一名社会学家的身份,振聋发聩地呼吁社会学的研究者们多读点历史,运用几千年中国文化的历史视野从事社会学研究。十几年前的呼声犹在耳畔,而其中所蕴含的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殷殷之情与深切期盼,以及更为深层的方法论意涵却鲜被提及。与此同时,费孝通自身毕生学术研究中“历史”所倾注的心血也为社会学界所忽视。

纵观费孝通毕生的学术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历史维度从未缺席——与历史相关的学术概念、学术话语及学术方法省思,一直贯穿费孝通三次学术生命的始终。1924—1957年是费孝通学术生命的第一阶段,在《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中,费孝通从对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的分析,提出了社会学的经典概念

“差序格局”和“双轨政治”。在《皇权与绅权》中,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四种权力结构,即皇权、绅权、帮权和民权^①。在对《昆厂劳工》的研究总结和反思中,费孝通意识到“社会情境”^②对劳工的影响,开始思考传统的社会结构为何会在现代工厂组织中存在及其作用和意义。及至费孝通学术生命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历史”愈益逐渐生长为一种与费孝通的生命体验、学术历程、历史感知、文化认同相关的社会学本土论和学术方法论,在费孝通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具有丰富的意涵和深远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学界对费孝通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已经展现了费孝通思想的多重维度和理论深度。已有对费孝通的历史观和历史意识的探讨,以乔健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发表的《试说费孝通的历史功能论》和朱小田在《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发表的《论费孝通的历史观》两文较具代表性。

收稿日期:2020-0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景观建构机制及路径研究”(18BSH09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丹丹,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3),主要从事乡村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研究。李若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哲学、历史、文献、语言研究。

费孝通对功能学派的历史拓展,学界讨论得较早也较多,乔文比较有代表性。乔文指出,费孝通对西方功能学派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历史因素纳入其中,并创造性地提出“活历史”“三维一刻”的概念。经过费孝通的创造性转换,功能理论具备了新的历史面相,且增强了包容度和诠释力,乔文将经转换后的功能论称为“历史功能论”。朱文试图在社会史与人类学跨界沟通的视域之下,较为完整地分析和展现费孝通功能主义历史观的丰富内涵。当历史学界惊呼费孝通思想的历史面相犹如“明珠暗藏”^③之时,社会学界亟需重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由此推进中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在此,我们将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和历史面相总结为五个方面:即早年所受社会史的影响、历史功能主义、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社会情境的历史之维和晚年的社会学方法论反思。其中,历史功能主义在上述乔文中已经有所论述,且学界已形成共识,本文不展开论述。另外,关于费孝通的历史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④和“双轨政治”^⑤,我们已经另撰文讨论,本文也不再提及。以下就从社会史之尝试与影响、社会情境之历史维度和方法论之反思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社会史之尝试与影响

费孝通思想与民国时期社会史之间具有一定关联,这种思想关联及其内在的复杂脉络,在社会学界对费孝通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长期以来,费孝通的本科学位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及研究论文《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赵旭东和齐钊在一系列研究论文中对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进行了系统、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指出学界由于对费孝通此项研究的忽视,导致对其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认识缺乏完整性。他们认为,费孝通的这篇论文糅合了文化传播论和文化功能论,是一个有别于功能论传统的研究特例,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播论色彩。他们提出,要将费孝通的学士论文纳入其一生学术研究中,从知识论、方法论和文化观三方面把握费孝通

倡导的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的演变过程,多学科融合一以贯之的态度与实践以及重视文化功能论、文化传播论与历史之间的结合与互动^⑥。

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曾刊登于由燕京大学社会学学会主编的《社会学界》(1934年第8卷)上,该文前面的编者按语中说:“本文是费君用了三年的功夫,经过吴文藻,顾颉刚,潘光旦,王佩铮,派克(P.Park)及史禄国(Shirokogorov)诸位先生的指导及批评,五次易稿而成的,审慎经营,确值得向读者介绍。”^{[1]115}其中,顾颉刚的影响颇值得关注,这也是我们分析费孝通思想中历史面相的一个重要方面。顾颉刚是20世纪的中国史学名家,是历史地理学、民俗学和边政学等多门学科的奠基者,在方志学领域也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方志学和历史地理之间具有特殊的姻缘关系,顾颉刚本人对方志学有较深的研究,对近代方志学贡献较大,由于没有方志学方面的专著问世,学界对顾颉刚在方志学方面的成就也有所忽视^⑦。

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史学方法论上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世纪之初,受近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新史学”潮流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发端,而20世纪前半期被纳入“社会史”范畴的诸多研究类型,都可以在“新史学”的思潮中找到理论端倪。因此,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亦可谓滥觞于“新史学”的潮流之中^⑧。各派社会史家的理论来源并不一致,受马克思唯物史观、法国史学、孔德实证主义等影响的不同学者,都强调社会科学对历史解释的影响,但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历史,并没有形成非常固定的研究范式^⑨。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不少不同专业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努力发掘“下层”民众社会的历史,“内容涉及社会风俗、民众信仰、婚丧嫁娶等多方面”^{[2]134},而顾颉刚正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顾颉刚对社会史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民歌、民间故事和民众信仰”^{[2]135}等方面。1919年,顾颉刚参加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该运动开始于1918年初,主要是为了“激发研究中国民俗的兴趣”和“彰显中国民间文艺的光辉”^[3]。顾颉刚对民歌的兴趣更偏向“民众社会之情状”^{[2]135},他

对关于孟姜女的民间故事研究,也体现了他透过民间故事探寻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独特视角。

1929年秋,顾颉刚几经辗转与反复抉择,最终来到燕京大学任教^⑨。费孝通1930年秋由东吴大学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1933年费孝通自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社会学学士学位^⑩。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担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曾任教于多所大学的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工作时间最长,学术研究最为精深”^{[4]52}。在燕京大学期间,顾颉刚与吴文藻、谢冰心两位虽专业不同却过从甚密。1931年,顾颉刚与吴文藻等一同到河北定县、大名,河南安阳、洛阳等地考察。1934年顾颉刚与吴文藻、谢冰心一起访问了绥远^⑪。此种情形之下,上文所引“编者按语”中提及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受到顾颉刚之影响实属自然。

早在1937年,费孝通在《读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这篇书评中,谈到自己曾受顾颉刚一篇文章的启发,开始尝试运用社会史的方法开展研究。费孝通提到的这篇文章是顾颉刚与朱士嘉一起合著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1931年刊载于燕大社会学会的《社会问题》第一卷第四期。朱士嘉在回忆顾颉刚的文章中曾提及此文。20世纪30年代初期,朱士嘉曾在燕京大学倾听顾颉刚讲授中国地理沿革史,顾颉刚主动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借给他看,让他学习方志学说,还联名起草了《研究地方志的计划》^⑫。

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充分意识到地方志的研究价值,“地方志是中国的特产,是未经开辟的新大陆,是研究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的深藏宝库”^{[5]330}。并提出地方志这种“旧材料”能带来崭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论。顾颉刚认为,地方志材料丰富、信实,里边常有难得的材料,且具有平民化的特征^{[5]331—332},运用地方志材料能为未来中国史学发展提供新的方向^{[5]328}。

地方志作为一种“旧材料”,因其蕴含丰富的社会史资料这一新价值而被重新认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一向“眼光向上”,而运用地方志以及档案、家谱这些材料,采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则有可能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

展示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地方风俗和民众之日常。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一文所用的材料,并不是他亲自调查的记录,而是采自各地方志书^⑬,一共搜集到全国15个省份207个地方(其中有34个地方的亲迎婚俗资料摘录自《古今图书集成》)的地方志书上的相关记载^⑭。在同一时期,受社会史影响和启发,费孝通还著有《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一文,考察周族的通婚问题及亲属称谓。

1937年对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的书评,费孝通实为借评论该书而发表自己对社会史研究之理解,并提出他对社会史的态度以及对社会史“方法问题”^⑮的质疑。文中有一番对研究过程中所遇到问题层层深入的追问,虽然充满疑惑与不解,但这可贵的思索过程,正展现了费孝通作为一位社会学研究者,对与历史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时的心路历程。书评中,费孝通反复宣称他的尝试是失败的,这一失败正是费孝通对社会史方法和实地研究方法的比较与反思。费孝通的追问,显示出地方志的书面记载与实际情形之间可能存在的不同,亲迎风俗的记载和实际的亲迎风俗的运作之间的差距。而实地调查可以弥补和丰富地方志文本记载的不足,为未来的社会史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地方志”^⑯。

至此,我们看到费孝通在其学术道路之初,曾受到社会史的影响,并运用地方志对古代社会风俗进行过尝试性研究。费孝通一生都具有地方志的情怀^⑰,晚年他自己曾回忆说,早年受益于乡土志,大学毕业论文用全国各地地方志里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做材料写成,还称《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份乡土教材^⑱。这种对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视在其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并未中断,在通过社会调查获取一手资料之外,他也非常重视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和地方典籍收集资料^⑲,倡导历史资料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并多次强调读史的重要性^⑳。

二、社会情境之历史维度

本文在此用“社会情境”这一术语来总结费

孝通思想中的历史面相,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实则该术语来自费孝通在《〈昆厂劳工〉书后》一文中所写:“国衡这种分析,使我们从个人的生活习惯去解释现在中国新工厂中人事问题,走入了对于社会情境的分析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在现代的工厂组织中还会遗留着传统的结构?”^{[6]376}“社会情境”是一个颇可玩味且有丰富内涵的社会学概念,费孝通虽没有对这个术语进行明晰的界定和分析,但从中可以看到费孝通关注“传统”的影子。因此,这是我们发掘费孝通思想之历史面相的一个重要术语。

“魁阁”时期,史国衡在费孝通的指导下开展了一项对昆厂劳工的研究。1944年费孝通访美期间,曾将“魁阁”同人的部分研究成果翻译成英文出版,除云南三村研究外,另一本是一部劳工民族志即史国衡的《昆厂劳工》^①。闻翔指出,《昆厂劳工》是“魁阁”学术遗产中被忽视的一环,他专门讨论了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一文,对其在20世纪40年代对劳工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进行了分析^②。费孝通对劳工问题的研究颇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忽略^③,更在于费孝通的劳工研究展示出一种具有历史维度的理解力,对于今天的劳工研究以及历史社会学研究都极具启发。

为《昆厂劳工》撰写这篇后记之前,费孝通已写过几篇探讨现代工业的文章,包括《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1940年)、《劳工的社会地位》(1941年)和《新工业中的艺徒》(1942年)。费孝通特别关注现代工业中“人的因素”,他认为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不稳固,外来劳工和本地劳工如何稳定地为工业服务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在工业中”,“虽则他们已参加了新工业,可是从他们的生活习惯上说,还是充分的保留着农民的味儿”^{[7]316}。即根植于乡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中的农民,被从原来的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中拔起,植入一种全新的以工业生产为中心的工业化体系中,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费孝通举例说,农业生产中工作惯了的人,很难适应工厂中有规则的劳动^④。农业社会的劳动生产方式不同于现代工业里由时钟和纪律控制的“有规则的劳动”,

费孝通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在工业中”的很多问题需要追溯到农业社会的传统结构中去理解。

《〈昆厂劳工〉书后》继续了费孝通此前对劳工问题的思考,并受到勒普莱(Frederic Le Play)、涂尔干等法国古典社会学家以及当时美国哈佛大学专门研究工业心理学的梅岳(Elton Mayo)教授的影响,将“农民在工业中”的探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开始探索“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进入无组织的社会生活”^{[6]379},思考“现代工业组织中是否有达到高度契合的可能”^{[6]380},寻求“新秩序的方案”^{[6]384}。“在我看来,这本书使我们已经可以明白现在昆厂里所发生的种种人事上的问题是现代工业中普遍的现象,是出于从有组织的传统社会变化到能应用新技术的新组织中过渡时期的现象。在这过渡时期因为社会的解组,生产关系并没有建立在人和人的契合之上,因之传统的结构,因其曾一度给人以所需的契合,遗留在新时代成为非正式的潜在结构。这些潜在结构一方面固然满足着人们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却阻碍了新技术的有效利用。”^{[6]384}

在此,回到上文提到的“社会情境”一语,费孝通认为不能用“个人的生活习惯”^{[6]376}等这种个体化归因来解释现代工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农业到工业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人习惯的改造”,而是“一个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农业里养成的社会结构并不合于工业的需要”^{[6]372}。因此,要回到“社会情境”,要认识并承认现代工厂组织中会遗留传统的结构,会有非正式的组织存在,应该基于这样的社会情境来思考如何建立新的组织和秩序。费孝通以社会情境的视角来看待劳工问题,并接续了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团结的理论脉络,在一种具有历史感的社会结构中探寻“社会解组的过程”^⑤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这种具有历史维度的探讨,对于我们无疑是相当有启发力的,而费孝通在此所展现的历史视野也不应该被我们忽略和遗忘。

三、方法论之反思

费孝通历史面相的最后一个方面,即费孝通晚年的方法论反思,这一反思强调了中国传

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伸展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之翼。费孝通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中,将对方法论的考察几乎完全置于中国文化传统中进行,是社会学方法论的中国式思考^⑤。费孝通说自己晚年补课“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就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来读”^{[8]486}。钱穆是个热衷于“天人合一”的历史学家,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方法论的拓展也深受钱穆“天”“人”关系的启发。也正因此,自然地,从文化生态论转向了文化心态论,将眼光对准“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深刻意识到中国社会学的一个具有学术潜力的发展方向在于转向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费孝通赋予中国社会学以完整而饱满的人文品格,将对中国社会学人文性的强调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人文性的触角伸展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处和精华之中,在“具有历史性”^⑥的文化延续和精神传承的脉络中,重构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视野。

费孝通晚年对于文化的思考在中西古今的交汇点上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人文品质和学术品格,并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植根于中西古今的社会文化与思想史传统之中。费孝通强调要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的基本问题^⑦,而这些基本问题恰恰体现和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

费孝通以“人”的研究为例,区分了中西思想传统中对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不同理解。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人神构成了人的基本生存境遇。“人”的研究必然包含诸多层次,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与我的关系、人与自身精神世界的关系,即人与心的关系以及心与心的关系^⑧。其中,人、自然、社会具有复杂的关联性。人的生物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与人的社会性相互包容的;而社会的存在与演化都是广义的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自然与社会并非二分的概念。将人置于自然的背景中来看,人和自然也是合一的,而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社会,也可谓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人、自

然与社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都是合一而非分离的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应该是我们定义“人”“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原则^⑨。但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受到冲击^⑩。中国历史社会学需要在中西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与激荡的脉络中,重新寻找传统思想变迁与延续的思想史轨迹,由此重新建构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费孝通强调,理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9]462}。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心”“神”“性”等问题,需要我们超越现代主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制约,在实证主义思路之外另辟蹊径,努力寻找到与中国传统“理学”思想进行交流的手段。

进而,费孝通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引出了人的群体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的问题,并强调文化性和历史性是与人生物性密切相关的两个不同概念^⑪。费孝通认为,社会中的人,具有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双重属性,而社会得以长久存在,正是因为文化的作用。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文化才能发挥作用。文化具有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个体生命的历史性,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传承,更为深刻与抽象的东西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是伴随文化而传承的。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包含着社会的传承,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结构等都是随文化传承的^⑫。因此,中国文化注重历史性,“中国是一个有祖宗和有子孙的社会,个人是上下、前后联系的一环”^{[10]512}。正是基于这样的连续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决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9]448}。

费孝通基于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深刻理解和思考,意识到并特别强调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它不会决然断裂或完全终止,也难以亘古如斯。中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要在这种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洞察历

史长河中思想传统与社会意识的延续与断裂、传承与接续、变迁与融合,在历史的罅隙中窥见变与常,体会民情与民心,获得对当代社会现象的历史性理解,感知和体察传统社会的世变、心态与秩序。

由此,费孝通以其自身研究实践和方法论反思,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大门。中国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既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更是中国历史社会学得以蓬勃发展的思想沃土。社会学想象力的历史之翼,让中国社会学翱翔于磅礴与厚重的历史天空,在古今中西思想交汇与文化互通之中,拓展了中国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延伸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并启示我们中国社会学该何去何从。时至今日,在中国历史社会学初兴与蓬勃发展的态势之下,中国历史社会学还需要更好地思考与吸收费孝通留下的有关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学术遗产,重新加深对费孝通思想历史面相的进一步理解。

注释

①参见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费孝通全集》(第六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268页。②参见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要讨论的“社会情境”并非源自情境社会学的“情境”概念。有关情境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杜少臣:《情境社会学:一个理论遗珠》,《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日。③参见朱小田:《论费孝通的历史观》,《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7页。④参见周丹丹、李若晖:《历史社会学视域中经典概念及其研究范式之反思——以“差序格局”为中心》,《史学月刊》2019年第2期,第95-115页。⑤参见周丹丹、李若晖:《中国古代地方力量“自下而上”的运作——重论费孝通的双轨政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01-110页。⑥具体可参见赵旭东、齐钊:《地方志与风俗的区域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第58-65页;赵旭东、齐钊:《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9-97页;赵旭东、齐钊:《亲迎“三区论”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对费孝通研究的一个补充》,《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第145-157页;齐钊:《亲迎的“三区论”——费孝通有关亲迎婚俗研究的再分析》,载赵旭东主编:《费孝通

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401页。⑦参见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8期,第40-50页。⑧参见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第132-144页。⑨参见李周峰:《良禽择木而栖:顾颉刚与燕京大学》,《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第52-58页。⑩参见费宗惠、张荣华:《费孝通年谱(1910年—2005年)》,《费孝通全集》(第二十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⑪参见李固阳:《顾颉刚教授在燕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阴山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102页。⑫参见朱士嘉:《顾颉刚先生语〈禹贡〉半月刊》,《晋阳学刊》1984年第4期,第85-87页。⑬参见费孝通:《亲迎婚俗之研究》,载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⑭参见齐钊在《亲迎的“三区论”——费孝通有关亲迎婚俗研究的再分析》(载赵旭东主编:《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中的相关总结,第227-228页。⑮参见费孝通:《书评》,《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⑯参见费孝通:《书评》,《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1页。⑰参见朱建民:《费孝通先生的地方志情怀》,《江苏地方志》2010年第6期,第21-23页。⑱参见费孝通:《乡土教材和社会调查》,《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2-545页。⑲参见朱建民:《费孝通先生的地方志情怀》,《江苏地方志》2010年第6期,第21-23页;齐钊:《亲迎的“三区论”——费孝通有关亲迎婚俗研究的再分析》,载赵旭东主编:《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401页。朱文梳理了费孝通一生与地方志结下的不解之缘,认为费孝通受益于地方志,也重视地方志,一生都是读志用志的典范。齐钊的这篇文章以及上文引用过的赵旭东、齐钊合著的一系列有关费孝通亲迎研究的文章,都强调了这一点。⑳参见郭国庆:《费孝通与中国传统典籍》,《华夏文化》2015年第3期,第55-57页。郭文强调费孝通治学重视实地调查,但不可忽视的是费孝通与中国传统典籍关系密切,一贯重视对于中国传统典籍的阅读和运用。在治学方法上,强调历史文献资料与社会实地调查相结合,并主张古为今用,阐释中国传统典籍的当代价值。郭文中详细列举了费孝通亲迎研究等相关文章引用传统古籍的具体情况,值得参考。㉑参见闻翔:《“乡土中国”遭遇“机器时代”——重读费孝通关于〈昆厂劳工〉的讨论》,《开放时代》2013年第1期,第211-222页。㉒闻翔:《劳工神圣——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㉓参见费孝通:《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费孝通

全集》(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页。^{②4}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全集》(第五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是1947年1月30日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学术演讲稿,收录作《乡土重建》的第一篇。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提到:“我们认为在中国现代的工厂里,扩大一些,现代的都市里,正表示着一种社会解组的过程,原因是现代工厂的组织还没有发达到完整的程度。”^{②5}参见周飞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第143-187页。^{②6}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页。^{②7}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②8}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②9}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441页。^{③0}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2页。^{③1}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③2}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

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448页。

参考文献

- [1]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界:第八卷[M].北京:燕京大学,1934.
- [2]李政君.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视阈下的“社会史”书写及其演变[J].近代史研究,2019(4):132-144.
- [3]邓谦林.北大歌谣研究兴起的机缘[J].鲁迅研究月刊,2017(1):23.
- [4]李周峰.良禽择木而栖:顾颉刚与燕京大学[J].贵州社会科学,2019(8):52-58.
- [5]顾颉刚,朱士嘉.研究地方志的计划[M]//顾颉刚.宝树园文存: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
- [6]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M]//费孝通全集: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7]费孝通.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M]//费孝通全集:第二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8]费孝通.暮年漫谈[M]//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9]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M]//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10]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M]//费孝通全集:第十七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Return Back to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Fei Xiaotong's Thought

Zhou Dandan and Li Ruohui

Abstract: In Fei Xiaotong's lifelong academic research and academic thought,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has never been absent, and the historical concepts, academic discourses, and academic method reflections have been throughout his three academic lives.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Fei Xiaotong's thoughts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history in his early years, historical functionalism of "three-dimensional moment", historical concepts of sociology such as "differential order pattern" and "dual-track politics",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itua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in later years,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ical sociolog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Fei Xiaotong's thoughts and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Fei Xiaotong's sociological research is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ciology.

Key words: Fei Xiaotong; historical sociology; social history; social context;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责任编辑/李 齐]